中国人的心态

中国人的国民性丰富而复杂，心态亦是千奇百怪，有着鲜明的独特性。

杨淼 著

版集团公司
出 版 社

中国人的心态

杨淼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文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中国人的心态 / 杨淼著. — 北京 ：文津出版社，2013.4

ISBN 978-7-80554-560-8

Ⅰ. ①中… Ⅱ. ①杨… Ⅲ. ①社会心理—研究—中国 Ⅳ. ①C912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 266822 号

中国人的心态

ZHONGGUOREN DE XINTAI

杨 淼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文津出版社 出版

（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）

邮政编码：100120

网址：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4.5 印张 135 千字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554-560-8

定价：29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8572393

总　序

中华传统文化有两大特点：一是历史悠久、宏博多彩；二是中外交流密切频繁。尤其是第二点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国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，是一种源远流长、横贯东西、异彩纷呈、底蕴深厚的文化现象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，中华文明都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。

应当特别提出的是，文化主体是人，而文化是离不开人的。过去长期就有“知人论世”的成语，这当源于孟子的话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有记孟子云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”意谓：吟咏人的诗歌，研究人的著作，不了解他的为人，可以吗？所以要讨论其人其世。这确是启人之思，故“知人论世”传为成语。也就是说，研究文化，就必须研究人。

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其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和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中，都反复强调种族和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政权割据时代，还是隋唐全国政权统一时期，都应将不同种族的人与各领域文化作比较综合研究。他将人与文化作综合探索，确甚启人深思。

历史的车轮从古走到今，中国经过最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经济建设日新月异，取得了斐然的成就，这使中国瞬间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。人们竞相谈论中国现象，谈论中国人的思想、素质和形象。在此之际，收集中外两个方面的学者在不同角度对于中国人特性的阐述，结集成书，将是一个具有客观性的思想成果。文津出版社编纂这一套《中国人》丛书，不仅会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，当也能启迪读者研讨

历史和探索现实的深切思考。

此次编纂的《中国人》丛书，有两部为外国学者于19世纪后期所作，有两部为中国前辈学者于20世纪前半期所作，其他为我们当代学者关注现实的专著，这当也很有特色。中外学者对中国人、中国文明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，可以说是不同文化观念的交融与互补。作为东方大国，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被世界所认识，以及这种认识的日益深化，当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课题。

近代中国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，受外国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，积贫积弱。外国人蔑视中国人，但他们又畏惧中国文化的力量。一些到过晚清中国的西方人，就是怀着这样一种矛盾交织的心理，记录了他们对中国人的观察和理解。这其中有对晚清社会现实的真实记录，也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迷惑不解，也难免有一些西方的种族傲慢和自大。如本丛书中的《中国人的素质》和《中国人的本色》，两书作者一个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，一个是美国外交官何天爵。二人均于晚清时期来到中国，并在中国生活多年（明恩溥34年，何天爵16年）。他们深入中国各地、各个阶层，紧密接触民众，根据其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，又加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写成以上作品。作者以西方人的视角，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各个方面全景式地观察、描摹了晚清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样态，并从中剖析和展示了当时身处没落的封建社会的中国人的各种品质。作者本着客观态度，既颂扬了中国人优秀的一面，也批评了中国人的某些劣根性。基于作者活动区域和西方立场的局限性，书中有些内容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看法仍有失偏颇。特别是百年后的今天，中国人各方面品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书中有些评论已不能完全适用于现在。但之所以仍将这些书纳入出版，是因为它对于我们理解当时中国人的国民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对于我们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、克服一些国人的劣根性、优化中国人的国民性，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。

这次选择的两部20世纪早期之作，也颇有特色。《中国人的精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神》著者辜鸿铭（1857－1928），祖籍福建，出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，后长期生活于中国本土。他学博中西，号称“清末经杰”，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中国的文化与精神，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他在此书前言中写道：“学习中国的典籍与文明，对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是大有益处的。”此书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，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，并拟改变部分西方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偏见。据说此书印出后，在西方形成了“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，不可不看辜鸿铭”的说法。另一部《中国人的修养》，著者蔡元培（1868－1940），他于1916年至1927年间任北京大学校长，在近现代教育建设中起了很大作用。此书秉承中华修养传统，并融汇西方的公民教育观念，教导中国公民如何进行道德修养，是一部此前百年罕见的公民道德实践之书，于现在的教育实践中，对社会大众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也会有指导作用。

而关于现代中国人的真实面貌，体现在当代中国作家的笔下，则是另一番品味和风格。例如本丛书中《中国人的休闲》一书，作者以流畅的随笔形式，介绍了中国个性鲜明而又源远流长的休闲文化，着重强调了中国人休闲的品味与情趣，推崇自我心境与天地自然的交流与整合，这无疑对休闲文化盛行、提倡悠漫生活大有裨益。而在《中国人的境界》中，面对“境界”这一深邃的中国哲学命题，作者或耕读暇思，或旅途行色，以诗意的笔触道出中国人几千年来人格思想的最高境界，即始于“修身”、“齐家”，终于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，从而实现最高的社会理想——道德完善的大同世界。《中国人的德行》则从公德、社会、文化、民性、生活、两性、修养等方面对中国人加以剖析，通过自我批评、自我反省，指出中华民族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良道德观念和行为，以此警醒世人加强自身道德建设，提高自身素质，使中华民族道德形象更趋完美。

本丛书以“中国人”为主旨，选录有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的著作，采用宽泛自然的选编方式，使本丛书在解读“中国人”这一宏

大主题时，给人以全面、客观之感。撰写者既有中外作家，也有近现代作家。如此，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就以立体丰满的形象耸立在世人面前，也使世界对中国人的了解更加深入透彻。

我通读文津出版社这次所编之书，期望可再续编，继续上下求索，开拓进取，不断出版中国文化精品。

傅璇琮

2013 年 5 月

前　言

心态，就一个人来说，其实指的就是心理状态。人们常说，“心态决定命运”“心态决定人生”“心态决定成败”，可见心态的重要性。一个心态良好的人，无论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处境，都能很好地解决所面临的问题。

而以“中国人”这一群体作为“心态”的讨论主体，就上升到了国民性的高度上。所以，一开始以“中国人”这样一个话题来开展议论，确实感到有些诚惶诚恐，担忧力不从心。因为就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一问题，一是珠玉在前，正如余秋雨所言，已经有辜鸿铭、林语堂、柏杨这些高手做过相当精辟的议论，嚼别人已经嚼过的馍，自己也会觉得无味。二来是题目的范围和内涵过大过深，无论从哪一处说起，都可以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，而这样的文章，是需要专家才能够胜任的。因此，我在这里就不再做高头讲章式的论述，而是以随笔的形式，以较为轻松的笔调做些弹拨，兴之所至，不拘一格，这也许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更增加一些趣味性。

其实，对于“国民性”的剖析，在前人那里是很不同的。辜鸿铭的《春秋大义》、林语堂的《吾土吾民》，回护的成分显然要多一点，而柏杨，则偏重嬉笑怒骂。着眼点不同，结论自然有别。

民族性格的形成，本来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世界性问题。中华文明

产生在黄河流域这么一个不算太肥沃也不算太贫瘠的地方，这就使她从一开始便有别于生活在热带或寒带的民族，有着更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中国的“国民性”问题之所以在20世纪初开始凸显出来，成为一个话题，这与中国在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有关。

大概是太过古老的缘故吧，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到了19世纪当儿，几乎都不怎么景气，这也是历史运转的周期使然，或者就是所谓“事关气运”。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永远保持它的蓬勃向上的势头而不衰。曾经的汉、唐时代，中国犹如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少年，充满着民族的自信心和创造力。可是高潮过后，仿佛就走上了一条“下行通道”。一些消极的东西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积淀下来的。到了近代中国，更是一度几乎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。一些新的消极现象，比如鲁迅所说的“西崽相”等等，也就应运而生。

历史的运行是否真的有它的周期性，如果有，则又是一种怎样的周期，这些我们都无法妄加揣测。民族性格的生成，有其先天的因素，也有后天的促成。我们所能做的，只是做些解剖病因的工作，尽其所能地使它恢复原本的健康。至于历史的周期，那就是非人力所能为的了。

目录

前　言　/1

第一章　政通人和之梦　/1

中国人的乌托邦　/1

“大团圆”情结　/5

难得“中庸”　/9

千年游侠梦　/13

两种英雄崇拜　/17

《包青天》依旧卖座　/21

“师道”的今昔　/26

从“孔子学院”说起　/31

第二章　人格与功过　/37

“史官”人格　/37

漫谈“孝道”　/42

人性的困惑 /47
西门庆走红 /52
“第三条道路”存疑 /56
杂说“四大美人” /61
第三章 智巧与道德 /65
“智谋”的杞忧 /65
“散沙”和宗派 /71
“神仙”踪迹何处寻 /75
“纤足”的迷恋 /79
第四章 恕与妒 /85
呼唤宽容 /85
东西方嫉妒比较论 /89
也说南人和北人 /94
中国的看客 /98
难治“健忘症” /102
生死的怪圈 /106
第五章 名位与风雅 /111
闲话“官本位” /111
座次问题 /116
为“附庸风雅”一辩 /120
留名与卖名 /124
“著作等身”与一本书主义 /128
关于隐士 /131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第六章　义耶利耶 /137

义利之辨 /137

“财神”回归 /142

富人的形象问题 /146

“金融补课”的疑惑 /150

何方觅此一本书 /154

第七章　国粹种种 /159

“国粹”与“国渣” /159

阉人政治 /164

修谱热与宗法制度 /169

八股遗风 /173

“麻先生”胜过孔夫子 /177

新旧“五经”和饮食文化 /181

“宫廷秘方”之秘 /185

远去的乡情 /189

第八章　自尊与自卑 /193

永远的阿Q /193

“贞操”问题 /198

从“郑和下西洋”说开去 /203

门外说画 /207

“野尻”风波 /210

第一章 政通人和之梦

中国人的乌托邦

朦胧派诗人顾城在大洋洲的一个小岛上演出了一幕血腥的悲剧。他用最无诗意的方式杀死妻子然后自杀。消息传来，举国哗然。有人认为，顾城选择这么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，远离城市和人群，本意在建造一个心中的“伊甸园”，不料会导致这么一个玉石俱焚的结局。

顾城的悲剧其实是中国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的悲剧。这个悲剧表明：诗意的乌托邦只能保存在精神世界里，而不可以进入现实，一旦进入现实终将破灭。这样的结论未免令人气短，顾城同他个人王国的毁灭是否就意味着整个“理想主义”的旁落还很难说。当今社会个人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还不能算已经绝迹，顾城也不见得就是“最后

一个匈奴人”。马路上设摊的鞋匠梦想拥有一个庞大的制鞋工厂，歌舞场上的阔佬梦想拥有大观园里的“十二金钗”。这样的乌托邦，无论是生是灭，都无关紧要。有位评论家把顾城的个人主义的悲剧同法国大革命和中国“文革”相提并论，这实在有点不伦。英国人托马斯·摩尔的“乌托邦”是一个废除私有财产、建立公有制、实行计划生产、人人从事劳动的故事。若要谈论中国人的理想主义，也应该从这里开始。

自《诗经》呼吁“乐土乐土，爰得我所”（《硕鼠》）后，理想国的憧憬不绝于史，最典型的当然是陶渊明和他的“桃花源”。现在看来，诗人笔下的桃花源还是比较低调的：“春蚕收长丝，秋熟靡王税。荒路暧交通，鸡犬互鸣吠。俎豆犹古法，衣裳无新制。童孺纵行歌，斑白欢游诣。草荣识节和，木衰知风厉。虽无纪历志，四时自成岁。”看上去真像一个古朴的童话世界。在这里，“靡王税”是关键。躲开了“王税”，一切就可以回复到往古，连时节流逝也无须记录，更用不着徒生纷扰的智慧。汉晋以来社会动乱、人民逃亡的悲惨现实给诗人的刺激太深刻了。老庄哲学倒退的历史观又在诗人的脑膜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，所以桃花源的理想主义的建构，只能是后退的而非前瞻性的。不过，我猜想陶渊明一定偶然地闯入过这么一个地方，否则他的想象就无法达到这样具体和逼真。灵感的触发不会是没有原因的。

与陶渊明的乌托邦不同，正宗儒家的乌托邦总是包含较多的入世思想与进取精神。相传出于七十子后学之手的《礼运》篇中，便给我们勾勒了一幅“大同社会”的美妙图景：

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老有所

终，幼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藏于己，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。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

这个“大同”社会与桃花源有很大不同，虽然表面上也是假托往古，但整个图景背后起作用的东西不是“无为”而是“秩序”。这里的人们根本不能像桃花源那样懒散而随意。

孟子也是擅长“形象思维”的思想家，他的理想比《礼运》描摹得更具体：

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

——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

真是越说越来劲儿了。按说庶民百姓五十岁衣帛，七十岁才能吃上猪肉狗肉，理想并不太高，要求也不算过分。可是依旧有人要指责孟子是“迂阔而不切实际”。这也难怪，在旧时代，这种乌托邦同现实之间的差距委实太大了。差距太大便衬托出“明君贤臣”们治国的无能，激发大众的逆反心理。孟子是位质直的思想家，又动不动同别人辩论。他不懂得话要说得含混些，像《礼运》那样，模模糊糊，可望而不可即，正是恰到好处。所以后来孟子在孔庙里“从祀”的位置曾被人赶了出来，绝非偶然。总之，“衣帛食肉”对于做奴隶而不得的人们未免奢侈，还是规规矩矩做天子脚下的顺民，少去胡思乱想。

乌托邦是要想象力的，想象力得不到滋养，只会日见萎缩和退化。

董仲舒的理想是“更化”，主张“使富者足以示贵，而不致于骄；贫者足以养生，而不致于忧。以此为度，而均调之，是财不匮而上下相安”（《春秋繁露·制度》）。仲长统则赞成“井田制”，“今欲张太平之纲纪，立至化之基址，齐民财之丰寡，正风俗之奢侈，非井田莫由”（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）。出自儒生之手的这些乌托邦简直是“一蟹不如一蟹”，显得过于拘谨，想象力越来越贫弱。相形之下，还是《水浒》里的“八方共域，异姓一家，三教九流，不分贵贱，各有所长，随才器使”的宣言，更富有新鲜跳动的活力。洪秀全的纲领“天下多男人，尽是兄弟之辈；天下多女子，尽是姐妹之群……有无相恤，患难相救，夜不闭户，道不拾遗”（《原道醒世训》），也恰好与梁山好汉们同调。这份被涂抹成不同色彩的“大同世界”的长卷，就这样从远古一直延伸到了康有为“秘不示人”的《大同书》……

“乌托邦”是个很见巧思的译名。乌托邦者，子虚乌有之乡也，也许注定了是个难以寻觅的海市蜃楼。但它的价值也恰恰在这里。中国人正是在这点理想的星光的照耀下，才这么前仆后继地穿越了千年历史风尘。然而经历了“大跃进”、“上山下乡”、十年“文革”等等的一代中国人，普遍地多了一份沉稳心态和务实精神。大家经商的经商、炒股的炒股、出国的出国，当年的“理想主义”热情早已褪色成一个遥远的梦境，“理想主义”也成了一个“浅薄可笑”的名词。然而人们总有一天会明白，仅仅拘守于世俗的“现实主义”也未尝不是一种浅薄。如果顾城之流真的成了中国最后一代理想主义的代表，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的悲剧。

“大团圆”情结

《阿Q正传》的最后一章写到阿Q被枪毙，而标题却是“大团圆”。挨枪子儿怎能叫“大团圆”？的确，这是鲁迅先生的独创，而对于一般迷恋“大团圆”结局的人来说，实在煞风景。现实生活毕竟不是舞台，在舞台上是“大团圆”，在生活中或许就是“挨枪子儿”。

本以为挨了枪子儿的阿Q这辈子是再没有“大团圆”的希望了，不料前不久书市上又出现了一部叫做《阿Q后传》的小说。小说模仿《金瓶梅》改写《水浒》的方式，西门庆没有死，阿Q也复活了。不但复活，而且同吴妈成了夫妻，继而又与赵太爷叙旧认了本家，并成了什么“蓝军”统领，住进了城里的大衙门。总之，一切功德圆满，皆大欢喜。中国人“大团圆”观念的执着和坚韧，令人慨叹，称之为“情结”，实不为过。

“大团圆”的模式也有多种。“落难公子中状元，后花园私订终身”，生旦团圆，各遂心愿，这是第一种，也最为圆满。诸如《西厢记》《拜月亭》《玉堂春》等均可划入此类。次一等的是《孔雀东南飞》《梁山伯祝英台》等，生不能同衾共床，死了也要结为连理或化作鸳鸯蝴蝶。更次一等的便是《窦娥冤》《活捉王魁》的模式，生时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